



俯仰集

SANWENXINGZUO

止庵

自选

引之则俯舍之

则仰实在不错

但真要俯仰而

不得罪于人也

不太容易所以

只好用以自勉

以期不管怎么

样都不要太拿

自己当回事

策划：宫 玖

SANWEN
XINGZUO

1267 /
676

俯仰集

止庵自选集

散文星座丛书

■ 上海文艺出版社



KAG2/1

420491



“散文星座”丛书序

宫 瓷

得天时地利之滋育，九十年代的散文无边葱茏。

或说有些芜杂。是的。也许这是生机勃发、花卉竞长不可避免的吧。无论如何，丰茂总比单调好。

这气象，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诱人光景。是不是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散文的回归，九十年代是散文的复兴？

稍加比较，就可看出：九十年代的散文，内容更开阔，思想更活跃，题材更多样，形式品种更丰富。而尤可称道的是，作家的精神更为自由，心态更为舒展。破除了套套框框，无拘无束，散文更具特色更见个性。

复兴不是复现。复兴是在以往传统基础上发扬光大，开拓创新。

九十年代的散文，天地高远，写散文者多得难以计数。老作家健笔依旧者大有人在，中年作家势头正旺，而青年作家，则是颖秀新锐。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学者都欣然执笔为文，有些艺术家也抑不住相继参

与。于是散文家行列中出现了年老的“新秀”。而才思出众的女作家更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或说，散文在九十年代复兴是复兴了，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作为个人，似乎还没有可与二三十年代相媲美的诸多散文大家。仿佛如此。但请别急，且期以时日，放眼新的世纪，谁能说年轻一代中不会出现光耀文学史的人物！

《散文星座》丛书无意标榜什么旗号，只想向读者推荐一批有切实独特感受、有真知灼见和文学才华的年轻散文作家，他们有的已被文坛注目，有的正引起注目。他们天南地北，风格迥异。散文的疆域原本宽阔，而凡佳作总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呢？

1998年3月8日

序

“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我看有些文章本来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所本有耳。”

十来年前开始读周作人的书，从《自己的园地》到《知堂回想录》读了不止一遍，最后归结为《知堂乙酉文编·谈文章》里这样一个意思，我对于文章之事才算真正有所悟得，用禅和子的话形容就是“如桶底子脱”。我们讲到写文章，从语言手法直到主题结构，说的总是不差，但如若像这里指出的作者态度一项不对，那么一切适得其反也未可知。因为“缺少其所本有”，全都成了制造效果的手段了；而作者在写作时本来应该是非对象化的，或者说是分离的，他把文章写出来之后才拿给读者去看。散文这一文体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自然状态，所有形式方面的追求

仅仅是以其自身达到完美为终极目的。在这个前提下，作者才有可能真实地表述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描摹他的所见所闻。这个话说出来很简单，但却是对散文的一种本质性的认识，我正是由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拿这副眼光去看古今中外的文章，凡是渲染，夸饰，做作，有意要去打动人，感染人，煽动读者情绪或兴致的，大概就没有好的。而周氏所谓“作态”，于遣词造句，标点换行，布局谋篇诸方面，无不可以有所体现。明白文章这样写不好，那么也就知道怎么写才有可能是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散文受到周氏的影响为最大。我想至少“周作人散文”这个题目，我是读通了的；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功夫之后，我大约可以说是知道他的文章好处的一人了。

当然天底下好文章并不只此一家，回过头来从先秦、魏晋、晚明、五四一直读到同辈人所作，以及欧美和日本散文的译本，让我喜欢的就有很多。而前述周氏关于散文的看法，早在《论语》中已经能找到依据，即所谓“辞达而已矣”，这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好的传统，只不过一向不大被人留心就是了。前年应邀编辑中国现代文史方面有文学色彩的论文亦即美文的选本，弄完后不了了之；但是我因此得以把这种文章读了几百万字，获益乃出乎意料之外。关于散文我从小所读多是五六十年代那批抒情之作，大概除了“像煞有介事”也就别无什么内容，我是中过

这个毒的，所以一旦明白过来就很讨厌这一路文字。然而后来我读叙事散文和随笔，发现也往往难得自然本色，原因在于作者写这些文章时所取的态度与写抒情散文其实是一样的。倒是那些论文真正是实实在在地说出一己之所得，并不指望读者能时时起点什么反应。这才是我理想中的文章写法，所学直可供我受用一辈子的。其中最看重的是浦江清、孙楷第、顾随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这些有文学色彩的论文亦即美文是理所当然地列在散文的范围之内，其地位绝不低于抒情散文等。我并不是要在这里比较文章样式的高下，虽然一般说来内容愈是没有分量就愈容易写得作态；无拘什么样式，关键还在于怎样去写，或者干脆说写时抱有何等的态度。不过我是把实际风行至今的前述那种言之无物和滥抒情的东西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一次反动，我自己写文章，颇有些自不量力地要对这反动再来反动它一下子。此外顺便说一句，抒情散文里通过情景描写、意象运用和语言修饰制造的所谓诗意，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把文章写得虚张声势而已，说穿了也还是一种作态罢。

我是医生出身，文学上的一点所知全是凭着兴趣自学的，所以觉得不好的即使名声显赫或者地位重要也只有敬谢不敏了。相反倒是历来那些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文章比较能得我心一些，诸如诗话、词话、语录、笔记、题跋

等，在我看来比《古文观止》里韩柳欧苏辈所写更说得上是真正的散文。在这方面，我以读者的身份偶尔当当作者，作态的文章我读来难受，我自己当然也就尽可能不去写这种让人难受的文章，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说是我对自己写作的头一条要求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写文章，迄今为止并没写出多少，我想这与我没有学过文科一样不是值得遗憾的事。文学之外我别有工作，文学之内其实这也算不上是首要的事体、我不指望我的文章哪怕是在内容上能对于读者起到什么作用。这与我自己的思想也有关系，无须在此多谈，我只想说我从来就不打算做一个启蒙主义者，所以前面关于周作人说了很多，简直是有点儿感谢他了，可我和他之间还是有着这样根本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文学史上找一个榜样的话，我倒想举出苦雨斋门下一位弟子，即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废名是也。废名的成就需要另行专门总结，他的随笔我是经常找出来读的，真个是晶莹剔透，而我更景仰的是他写这些文章以及《桥》、《莫须有先生传》时对待文学的那个纯粹和义无反顾的态度。只可惜废名的随笔从来没有专门出版过，我倒时常有心替他收集一下子，老实说做这件事比我自己写文章要有意思得多。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目 录

序	[1]
关于写信	[1]
《樗下随笔》序	[4]
读《燕丹子》	[7]
女子故事	[10]
子在川上	[16]
来世与现世	[20]
关于诗人	[23]
戏剧人生	[28]
谈癖好	[34]
谈心境	[37]
我与自然	[40]
故乡的话题	[46]
假如	[51]
关于沙翁	[55]
原壤孺悲	[60]

关于孔子	[64]
姑妄言之	[74]
臆想天籁	[77]
迂阔之论	[81]
止庵说	[84]
《杨绛散文选集》序	[85]
我的父亲	[111]
西施的结局	[115]
生死问题	[122]
己所欲	[128]
记若影师	[134]
关于贾岛	[138]
我的哥哥	[143]
散文家浦江清	[147]
谈温柔	[151]
沧州前后集	[156]
反浪漫	[160]
托尔斯泰之死	[165]
关于关灯	[168]
最后的日子	[171]
在死与死之间	[182]
《关于鲁迅》编后记	[191]

死者	[212]
《如面谈》序	[216]
读书漫谈	[220]
再看张	[224]
卡夫卡与我	[228]
莫扎特与我	[232]
关于周译《希腊神话》	[235]
废名佚文考	[245]
爱情小说	[251]
关于《艺术与生活》	[255]
谈才子文章	[267]
《樗下读庄》序	[270]
后记	[279]

关于写信

我忘了有生以来第一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给谁、写了些什么的了。说起来这个开端也许还很重要，因为写信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占着一个位置。一个识字的人一生中可以什么都不写，但要说没写过信那恐怕是很少的，即使是文盲还要请人代笔呢。这是因为写信有用处，有这个需要。在需要之外，还可以谈到兴趣，爱好，等等。我自己好像就很喜欢写信似的。

我们写信，倘是问候起居，多少希望知道一点结果；倘是报告事实，也希望了解对方的态度如何，意见又是如何。所以来鸿去雁，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写文章发表出来，偶尔也可以看到读后感一类文字，但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比写信之有回信乃是必需。而且这与信本身写得好坏并没有什么关系。

《嵇康集》中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萨特写过《答加缪书》，也是绝交书一类，但是这封信最后有一段说：

“杂志对您是开放的，如果您愿意回答我的话，但是

我，我不再答复您了。我说了您对我曾经是什么，您对我现在是什么。但无论您能够对我说什么和做什么，我拒绝反驳您。我希望我们的沉默将使人忘却这次论战。”

我倒觉得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对对方回答的希冀，虽然话并不这么说。《知堂回想录》记载一九三一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时，将老教授林公铎解聘，林氏不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致胡博士的信，其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胡适并不回答。现在想起来林氏的境遇实在是很悲惨的。

蒲宁去国后写的短篇小说《素昧平生的友人》，是专门讲收不着回信的痛苦的。小说由十六封信组成，但不似寻常的书信体小说，这些信都是由一个人写的。一个女儿已有十五岁的贵妇，家居无聊，读书度日，忽然起念给一个作家写信。她在信中讲述她的生活，倾诉她的感情，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管她是怎样恳求。她先是寄托全部希望，后来失望了，最后只有绝望。末尾一封信写道：

“永别了，我的从未谋面的朋友，我在结束这种有去无回的通信时，就如当初开始给您写信时一样——满怀感激之情。我感激您没有回答我。如果回答了我，反而不好了。何况您又能跟我说些什么呢？再说，一旦信来信往，我们又怎能毫不为难地中断通信呢？况且我除了已经跟

您讲的外，还能向您讲些什么呢？我什么话也没有了，全都讲了。事实上，任何人的生活，只消两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无遗的。啊，是的，只消两三句话。

“我此刻有一种奇怪的心情，仿佛我失去了什么人。从此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同自己的家，同雾气腾腾的海洋，同秋天和冬天单调的生活作伴。……”

这篇小说我读了每每戚然不乐。我想世间竟有如此能体会人心的作家，蒲宁真是不朽。说来我并非给作家写情书之辈，平时朋友之间书信往来亦不可类比，但动如参商，天各一方，一点友情，总需要以相互呼应来维持罢，哪怕是寥寥数语，但报平安呢。因为大家毕竟谁也没有“只管耕耘，莫问收获”那般坚强。所以逢着给哪位写信如石沉大海，不见消息，是很感怅然乃至怨毒的。我的坏毛病又是一信不回，便无兴致再写二信，于是天长地久，朋友渐渐散失，有如风筝一一断了线，这真是令人遗憾之事。

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七日

《樗下随笔》序

前些时读《骆驼草》杂志影印合订本，有一篇署名惠敏的《闲话》，说：

“一个人到了‘遗嘱’的资格，我们真可以恭敬的一领教了。我且把这个遗嘱抄在下面：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参是《论语》里活得最谨慎的人，“吾日三省吾身”是他，“慎终追远”亦是他，难怪大限将近时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但即使不像他这般有意跟自己过意不去，又将如何呢。有时候我读到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些话，不知怎么总有些怀疑这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以我自己涉世的体会，好像事实恰恰是相反似的。不管怎么说，想好好活过一辈子是真够沉重，真够不容易，所以曾点言志道出：“莫春时，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遂说：“吾与点也。”这实在是对艰难人生的一种

调剂，朱光潜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这个意思罢。

周作人《夜读抄·小引》云：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

我读了此段文字颇有感触，伯宜公的一点梦想有如烛火之于长夜，弥足珍贵。当然可以由此进到旷远澹泊一路，但那也还是一种“艺术化”。如周氏为《古槐梦遇》作序所记：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庼’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庼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

我家房后有一株樗树，即俗称臭椿者。昔人有言，“黄连树下弹琴”，如今我在臭椿树下作文，其意庶几近之。在这树下住了多少年了，也别无感想。后来读《庄子·逍遙

游》，有一段话谈及此树：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遙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我们寻常人大约也只及得惠子的境界，若夫庄子则真正了得，一棵人人讨厌的臭椿也能说得那么美，以致于不材如我平庸的起居也与“彷徨”“逍遙”联系在了一起，我在樗下所写的平庸的小文章竟也显得（至少是自以为是）有点意思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